

| 天
Borderless
| 下



江海月明

杨景凡的精神世界

赵明 著



法律出版社
LAW PRESS • CHINA

江海月明

杨景凡的精神世界

赵明 著



法律出版社
LAW PRESS • 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海月明:杨景凡的精神世界/赵明著. —北京:法律出版社,2016.4

ISBN 978-7-5118-9275-1

I. ①江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杨景凡(1918~2001)—传记 ②杨景凡(1918~2001)—思想评论
IV. ①K825.19 ②D9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7264号

江海月明
——杨景凡的精神世界

赵明著

责任编辑 高山 汤子君
装帧设计 李瞻

© 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版本 2016年4月第1版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印刷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

印张 16.625 字数 257千

印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编辑统筹 学术·对外出版分社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印制 陶松

法律出版社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(100073)

电子邮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网址/www.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(100073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

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书号:ISBN 978-7-5118-9275-1 定价:58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目录

缘 起	1
一、“向死而生”者	19
二、暮年相遇孔子	44
三、理想主义的人生路	98
四、“理想主义”的救赎	156
五、“伦理法”的世界	257
六、谱就生命的史诗	296
尾 声	343
附录：杨景凡对中国古代战争的统计	360

缘 起

1.

我最早萌生写作这本小书的愿望,是在2002年9月的某一天。

那天上午,大约9点钟,我收到俞师荣根先生邮寄来的一本书——《景凡文存》,由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制,并非公开发行的出版物。

杨景凡先生的夫人周宇琳女士在书的“后记”中写道:“景凡生前艰苦思索,述而不著,不事张扬。我们珍惜他毕生的追求和这份思考,‘善意地违背’他的意愿,将他晚年的存稿编辑出书以知往鉴来。因此本书不公开发行,范围囿于亲友及他的学生、弟子和法史界的同人。这是我们的初衷。”

景凡先生是我的师爷。我获得《景凡文存》,乃

属情理中事。

睹物思人，捧书忆往，这也自在情理中。

2.

2001年6月，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韩延龙先生、李步云先生念完在职博士便调离了西南政法大学。打包托运完行李后，我去拜望景凡先生，向他辞行。

先生家住西政校内胡家院高层楼，高层楼前有座旱桥，他时常独自一人站在桥头，凭栏凝望前方。记得有一次我从他身边经过，特意问过他：您在想什么？他似乎答非所问：晒晒太阳。

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，我还在五十米开外，就看见了依然独自站在桥头、凝望前方的先生，于是快步前去，跟他打了声招呼，向他问了安。然后，我向他简单汇报了工作调动的情况，有些怅惘地说道：“杨主任，明天上午我就离开重庆了，我是专门来向您辞行的，您要多保重！”

先生了解我的生活状况，对我的工作调动没有丝毫责备，轻言细语地说：“好，好，到湖南那边，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好就行，别的不必多顾虑。”

这时候，师太来了，来接他上楼，回家吃晚餐。先生当时 84 岁了，视力很差已经好多年了，说他“凝望前方”，其实是说他“宁心静思”，而在生活中，要是没人搀扶，他独自行走是很不安全的。先生邀请我到家里再坐会儿，叫师太给我做碗面条当晚餐。我认识二老已经整整 10 年了，和他们一起用餐，这还是第一次。尽管先生没明说，但我知道他的心意，他是在给我饯行，这让我很感动。多年后，每每想起师太做的那碗面条，心头就感觉热乎乎的。

晚餐后，师太给我沏了盅热茶，就去厨房洗碗了。先生告诉我：“想抽烟就随意抽，不要介意什么。我想再和你说会儿话，你这些年有进步，是个可以言道的人了。”这话让我有点懵，一时接不上茬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以前拜见先生，大都是礼节性的，时间不长，他也不怎么说话，从不问我的学习情况。即便我向他提问，他也只是简单作答，有时竟然像没听到一样，一句回答也没有。记得有一次我问他：“您最近在读什么书？”他答道：“在读《顾准日记》。视力不好了，用女儿从德国给我买的放大镜，也还是比较费力。”我告诉他，自己也读过《顾准日记》，但没什么感觉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对我说：“你们年轻人没有

经历,读不懂,是正常的,我是读得老泪纵横啊!”之后就不再多说什么了,我也没再多想,没再多问,静静地陪他坐了一会儿,就起身道别了。

我点上烟,缓缓地吸了一口,默默地看着他。先生语气平和地对我说:“你要做真学问,伪道学不好。”这是长者对后生的嘱咐,也是表达希望。我认真地点点头,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对他的承诺。

在评说了一番学界动态后,他若有所思地问我:“你怎么看儒家的‘道统’?”

我没有多思索,吞吞吐吐地回答道:“我晓得韩愈的‘道统’说,是对佛学的套用,可谓用心良苦;也多少晓得点宋明新儒学的‘道统’论,派系分明,争吵得厉害,都喜欢编故事、唱高调;还读过一些当代新儒家的著作,他们的‘道统’说,好像总抹不去‘西学’的痕迹;我平时喜欢读《论语》和《史记》,但不怎么联想‘道统’说,更多地体会到的,是文字传达出来的鲜活的生命感……反正我不喜欢,甚至有些厌恶‘主义’说教,‘道统’论与‘主义’说教,我是等而视之的。杨主任,您的这个问题,我不能说没有自己的看法,但心头是相当困惑的,有许多不解的地方。”

先生对我的东拉西扯,没有打断,也没有什么回应,而是继续问道:“韩愈那个‘道统’说,搞了个

家谱,你看出什么特点了吗?”

我有些好奇:“什么特点?我没看出来啊!”

他像是自言自语,继续缓慢地说道:“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,都是政客,在韩愈那个家谱中,只有孔子是个书生,他为什么要添加一个书生呢?周公‘一沐三捉发’‘一饭三吐哺’,说是体现了‘礼贤下士’的德性,这符合常识吗?是谁编的这个故事?是他自己编的吧?我看周公是个大骗子!”他说到周公“吐哺捉发”的典故时,还用手比划了一下。

听了他的这番话,我当时被震撼了,眼睛瞪得大大的,脑子瞬间一片空白。坦率地说,这是我迄今为止遭遇过的最强烈的一次思想冲击。

我给他递上水杯,让他喝口水;然后,给他递上一支烟,他没接,叫我自己抽。

他自己把话题转开了,说:“我记忆不好了,是不是年纪大了,有些脑萎缩了?”我感觉,他这话有玩笑的成分,也有几分认真。我跟他说:“您这一辈人是幸运的。”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说,我回答他:“因为您有信仰。”他像是深有触动似的,快速地接话道:“是啊!所以我有痛苦。”这是那天晚上,他对我说的最后的话。我明白其意,精神信仰与世俗生活难免冲突,这会带给心灵以困惑,大凡认真对待人

生者,都可能遭遇这种情况。

我起身对他说:“杨主任,您和师太该休息了,我走了。”他点点头,没有言语。师太送我到门口,我把门带上,没让她出门。

走出高层楼,我看了一下时间,快到夜里9点钟了。我和先生以前从没有如此长时间地谈过话,差不多4个小时啊!不过,打扰老人这么长时间,我却没有一点儿愧疚,相反,倒是很兴奋,心里洋溢着无比的温馨和激动。

我抬头望天空,天空很洁净。

我漫步遐思,校园里,路灯很亮丽。

3.

第二天,我到了湖南的湘潭大学。

最初,我们一家住在招待所,等待学校安排住房。那时,我没有手机,没有告诉任何亲友新的联系方式。直到8月底,一家三口才搬进新家,安装了电话。我给俞老师打电话,向他报个平安。

万万没有想到,俞老师告诉我:“杨主任已经去世了。开追悼会的时候,没法与你取得联系,很遗憾!”

在听俞老师述说的过程中,我一直含着眼泪,有些哽咽,偶尔插上两句话,脑子里不断地闪现着一个词:世事无常。在我们爷孙那次谈话大约50天后,2001年8月3日,景凡先生就与世长辞了。我因工作调动去向他辞行,竟然成了我与他的永诀!

在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后,我非常难过,好些天都心绪烦乱。总想写点什么,说说我对他的敬重与感激,谈谈我对他的思念与理解,却又数次刚开了个头就煞了尾,总是成不了文。

其实,那时的我,真不了解他丰富的人生,只不过知道一些他的工作经历罢了。即便从别人那里听说过他的一些人生故事,充其量也只是些故事梗概,以及别人从中总结出的一些结论,粗疏而抽象,甚至难免武断。

再说,作为他的徒孙,我读研究生时,他已经离休好几年了,没给我们上过课,我们也没共过事。虽然和他多次见面,可在一番礼节性的毕恭毕敬之后,知冷知热、知根知底的交谈,自然是没有的。只是从他偶尔表达出来的对世事的愤激与判断中,自己常常突然受到震撼,甚至陷入一阵迷惘。不过,我早就认定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,是一个有个性的人。

我敬重像他这样的有思想、有个性的长者,对

他的接待与关心,也常怀感激之情,可毕竟不理解他的思想,难以真正领悟他的人生智慧。先生公开发表的文字不多,我那时阅读过他与俞老师合著的《孔子的法律思想》,为准备研究生考试,当然特别认真地读过他主编的《中国法律思想史简编》,尽管由此了解他的一些学术观点,但常识告诉我,这与他的人生智慧,肯定是难相等同的;而且,我还知道,在晚年,他对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持否定态度。当然我也晓得,他离休后仍然坚持读书,可他究竟读了些什么书,为什么要阅读,却又知之甚少了。

文章不写一字空,其实,空文也难写。

我在平复难过的心情后,终于打消了写点文字悼念他的想法。假如先生地下有知,相信他不会怪罪我的。

4.

然而,我想多了解先生一些,想真正理解他的人生,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主张,想领会他的人生智慧,又是从第一次与他交谈时起,就始终没有放弃的愿望。

我们第一次交谈,是在1992年4月。当时,我

拿到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通知单,根据往年的录取分数线,这次我考上研究生应该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已经考过两次了,要不是俞老师为我力争,连这次考试资格我都没有;那时,学校有文件规定,本科毕业后工作满两年,才允许报考研究生,且报考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两次。所以,俞老师也很为我高兴,像是奖励似的,说要提前带我去拜见师爷;带刚入学的研究生去拜见师爷,是俞老师始终持守的一个传统。

这之前,我见过先生。俞老师设家宴招待江山,他是专程回母校拜见恩师的;俞老师叫我去先生家接江山。那时,高层楼的修建尚未竣工,师爷住在“东山”,俞老师住在“铁西”,两个教师宿舍区相隔有点远。我在先生家门口见到了他,彼此点头致意,没有言语,连我姓甚名谁都没有作自我介绍。当时,我没有资格称他“师爷”,我叫他“杨老”。

现在算是正式拜见先生了,向来有些莽撞的我,那天还是有些拘谨,整个拜访过程中也没敢多说话,说是与他“交谈”,其实有点虚而不实。先生抽烟,我也抽烟;我恭敬地给他递上一支烟,他没要,笑着说:“不抽你们年轻人的‘高烟’。”这是当时的流行语,“高烟”的意思是“高档烟”。他如此一说,使我顿时放松了许多。先生叫我随意些,他自

已点上了一支很廉价的“什邡”牌雪茄,舒缓地吸了一口。先生精神矍铄,端坐在一把普通得早已变色的旧藤椅里。俞老师拿了个矮凳子,坐在先生跟前,向他汇报学科建设的一些情况。先生话不多,始终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突然,他问道:“听说三峡工程上马了?”我回答说:“全国人大今天批准了三峡工程的建设,师爷消息好灵通啊!”他又陷入了沉思,过了好一阵儿,才自言自语道:“自古以来,就有人喜欢搞大工程。以前在北中国搞了个长城,是石头垒成的;现在在南中国又要搞个‘长城’,把水拦起来,是‘水长城’。”

我当时十分惊讶,张大了嘴。这是我第一次被先生的话所震撼。心想,这还真是个爱发牢骚的老爷子啊!

就是他的这番自言自语,让我对这次见面交谈记忆深刻,我以后时常回想起他当时说话的神态,绝无开玩笑的神情,他很严肃,明显的,还有些忧伤。

我在这所学校已经工作了5年,也偶尔听人说起过他,说 he 是个老革命,是个老党员,长期从事“地下工作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先是在西南公安部工作,是个部门领导,还担任过情报站站长,后来申请调入西南政法学院当老师,不再从政了。他课上得很好,敢讲自己的见解,人很正派,爱发牢骚,喜欢

骂人,有些不近人情,行政级别和校长是一样的,享受司局级待遇。我那时虽然年轻,没见过什么世面,但对一个有名望的老革命、老教授如此的做派,倒也没觉得稀奇。

我怎么也没有意料到的是,这位老革命、老教授,我现在的师爷,他发的“牢骚”,竟然如此的高级,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幽默。

这是一次私人性的交谈,不是公开发表意见;先生一生忧国忧民,新中国成立前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,有极高的保密性,说话很有分寸,有高超的谈话技巧。关于三峡工程的高级“牢骚”,我没听说他在其他地方也发过。现在,我把它记录下来,先生不会“批评”我,说我“泄密”了吧?

正是这次见面交谈,让我隐隐感觉到,先生有一种深深的孤独,有一种沉沉的痛楚;更让我明白这样的事实,自己现在尚无法走进他的心灵世界,理解不了他的思想,压根儿就无法与他对话。沉默才是我合适的选择,如有机会倾听先生说话,就是自己的福分了。

当然,之前偶尔听人议论他,甚至揶揄他,而在我心中所形成的那种“倚老卖老”的印像,也因这次交谈而彻底消逝了。我现在明白了,要说“倚老卖老”,在先生那里,“老”是一种思想的深度,是一种

精神的高度,是一种历史的厚度,不是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;“买卖”的市场肯定是冷清的,不会火爆,即便他想卖,也少有人能买。

从那时起,我就开始敬重这位老人。而且,他是我的师爷这种身份关系,在我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淡化,几乎与我对他的敬重没有多少关联。在学制两年半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,逢年过节,虽然要去拜见他,但多是出于礼节。我是很想和他深入交谈的,但又一直没有准备好与他交谈的“话题”。再说,作为晚辈,我们去拜见他时,表达心意的话刚一出口,就被他有点严肃的回答给堵住了,能够继续交谈下去的情境不多。有一年春节,我们师兄弟三人去给他拜年,买了两条鱼,意思是祝他“幸福满满,年年有余”。我们刚说完这句祝福的话,他就有些低沉地说了句“有余也余的不多了”,不像是开玩笑。我们那时年轻,不知该如何接话了,心里直犯嘀咕:“这个礼买得不合适哟!”坦率地说,有相当长时间,我是远远地敬重着他。其实,礼数本身就意味着距离。

当我念完博士,也经历了好些曲曲折折、坡坡坎坎,对人生,对世事,对学问,多少有了些真切的感悟,似乎有了些“话题”,也有了些“底气”,可以开始与先生真正地交谈了,先生却离世了,我们再没

有交谈的机会了。

因此,我伤感。

在知道先生去世的消息后,我回到重庆,先生的三女儿杨甸甸,我喊她“三姑”,陪同我去给先生上坟。我跪在先生的墓前,一边给他烧纸钱,一边向他诉说了我的伤感。

我真希望,阴阳虽两界,但还是能够交谈的。

5.

还好,在先生去世一年后,我收到了《景凡文存》。

《景凡文存》收录的篇什,除了先生生前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、一篇为俞老师的《儒家法思想通论》撰写的序文,以及写给俞老师的关于“伦理法”的一封信,其余文字都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。我通过阅读这些文字,终于可以实现和先生“交谈”的愿望了。

2001年8月5日上午,在重庆石桥铺殡仪馆会议室,参加先生追悼会的亲朋好友和学界同人召开了“缅怀杨景凡先生座谈会”,编辑印制《景凡文存》,就是大家在座谈会上议定的。俞老师和甸甸